

历史性转折还是短暂性波动

——对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变动由负变正的考察

□陈蓉¹ 顾宝昌²

内容摘要 上海的户籍人口自然变动在历经19年的负增长之后,于2012年首次由负变正,并于此后几年保持在零增长左右。这一方向性转变究竟是历史性转折还是短暂性波动,值得深入探讨。2012年以来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变动的方向性转变,是由于2004年以来出生数量增多,并多过一直处于小幅平稳增长中的死亡人数的结果。出生数量增多主要是由于一孩出生数增多所致,而一孩出生数增多又主要是由于年龄结构周期性的变动使得育龄妇女人群集中所致。随着育龄妇女人群规模的萎缩,出生数量特别是一孩出生数量增多的现象也将稍纵即逝。因而,这一方向性转变只是一个暂时性的现象,并不能改变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变动负增长的长久性趋势。

关键词 上海户籍人口 自然变动 负增长 正增长 零增长

作者 1陈蓉,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上海 200040)2顾宝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我国大城市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变迁趋势研究”(14CRK01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新社会问题研究”(14ZDB150)

1993年,上海开始进入户籍人口自然负增长阶段(出生率为6.5‰,死亡率为7.3‰,自然增长率为-0.8‰),是全国第一个出现人口自然负增长的省市。这一新的人口现象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学者们对上海户籍人口负增长形成过程及其原因,与人口政策、计划生育开展、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等的关系可能导致的后果,进行了系统的研究。^[1]从1993年至2011年,上海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持续保持着负增长水平,但却在2012年结束了长达19年的负增长,首次由负变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分别为8.51‰、8.25‰、0.26‰)。这一方向性的转变引起了媒体的一些关注,并围绕此问题进行了一些采访和报道,但鲜有针对这一人口现象进行深度研究的学术性论文或著作发表。事实上,2012年之后,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围绕着零点波动,2013年、2015年和2017年回到负增长状态,2014年和

2016年均又越过零点实现正增长。

那么,在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走低的情势下,上海这个在全国率先实现且长期保持户籍人口自然负增长的地区,为什么会反其道而行之,从负增长转向零增长甚至是正增长呢?其中的形成过程是怎么样的?其主要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这一方向性转变将会是长期性趋势,还是一时性波动?对全国其他省市而言,这是一个具有借鉴意义的信号吗?本文将基于对上海户籍人口出生、死亡、年龄构成等统计数据的系统深入分析,尝试回答这些问题,并就如何释放生育潜力进行探讨。

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 变动历程及阶段划分

对一个非完全封闭地区而言,其人口数量变动由出生、死亡和迁移(迁入和迁出)三个因素决定,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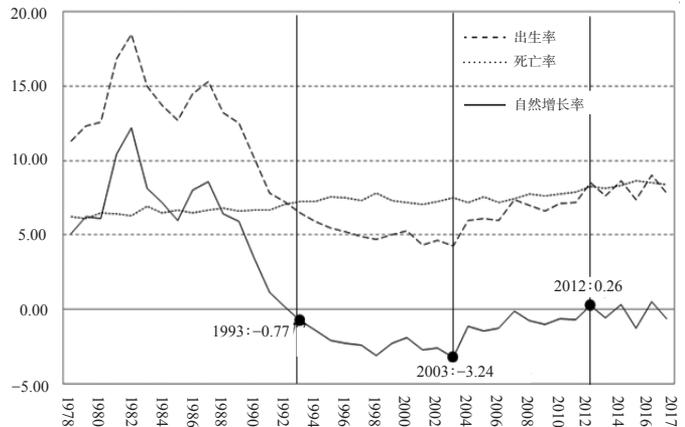


生和死亡决定着自然变动状况,迁入和迁出构成了迁移变动部分,写成公式即所谓的“人口方程”:人口总量变动=自然变动+迁移变动=出生人口数-死亡人口数+迁入人口数-迁出人口数。

这里的“上海人口”,严格界定在上海户籍人口这一统计口径上。但上海户籍人口实际上仍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人口,包含了户籍迁入人口,也有部分上海户籍迁出人口。据《上海统计年鉴2016》数据,1995—2015年,上海历年户籍净迁入人口数有波动,少则6万多人,多则近13万人,平均约9万多人,这对于1400多万户籍人口而言应该说是较小的体量。更重要的是,本文关注上海户籍人口的自然变动状况,而非迁移增长部分。户籍新迁入人口对自然变动状况的影响体现在:(1)计算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时,户籍新迁入人口对户籍人口这一分母产生影响;(2)仅当户籍新迁入人口在迁入上海之后有生育行为或者死亡,才会对出生人口数、死亡人口数的统计产生影响,即影响分子部分。因此,户籍新迁入人口对户籍人口自然变动的影响非常有限,更不可能是主导户籍人口自然变动由负变正的因素。

本文将主要聚焦出生和死亡两大因素对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变动的影响。当出生人口数少于死亡人口数时,人口自然变动为负增长;当出生人口数等于死亡人口数时,人口自然变动为零增长,但绝对的零增长在现实人口中是罕见的,能够见到的是在零增长点附近保持稳定或波动的人口增长形态,即相对的零增长状态;当出生人口数多于死亡人口数时,人口自然变动即呈现正增长。图1展示了1978—2017年上海市户籍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变动过程。从出生率来看,1978—1982年上海户籍人口的出生率呈上升趋势,至1982年达到最高点(18.5‰),之后开始下降,1993年为6.5‰,直至2003年达到最低点(4.28‰),然后开始在波动中逐步回升,2012年回升至8.51‰,2012年以后逐年小幅波动,2014年为8.64‰,2016年为9.04‰,是1993年以来20多年间的最高值,2017年又降至7.8‰。近几年上海户籍人口的出生率水平已回升至1990年前后的水平。从死亡率来看,1978年以来上海户籍人口死亡率保持着微幅增长态势,1978年为6.2‰,1993年时升至7.3‰,2003年为7.52‰,2017年为8.4‰。

图1 上海户籍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1978—2017年)(‰)



数据来源:《上海统计年鉴2004》《上海统计年鉴2017》《2017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7年的统计口径为户籍常住人口,其余年份的统计口径为户籍人口

正因为死亡率的变动幅度不大,自然增长率的变动过程与出生率非常相似。1978—1992年间,上海户籍人口增长率为正,且在此间处于不断上升之中,1982年达到最高点(12.2‰),之后开始下降。1993年上海户籍人口在全国率先出现负增长,此后至2011年底自然增长率持续19年处于负增长水平。在这19年间有一个时间点非常值得关注,那就是2003年。2003年之前,负的自然增长率持续走低,在该年达到最低点-3.24‰,2003年之后开始逐步回升,至2012年时首次转正(0.26‰)。近几年,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则是在零点附近波动,2013年回到0以下(-0.54‰),2014年又转负为正(0.32‰),2015年再次回到0以下(-1.27‰),2016年再次转负为正(0.5‰),2017年又降到0以下(-0.6‰)。

根据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上述变动特征,笔者将1978年以来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变动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2年,自然增长率为正;第二阶段:1993—2003年,自然增长率为负且持续走低;第三阶段:2004—2011年,自然增长率仍为负,但不断回升;第四阶段:2012—2016年,自然增长率由负变正,在零点附近波动。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方向由负变正发生在2012年,但自然增长率开始回升发生在2003年以后,即2003年以来的出生率逐步提高为增长率由负变正蓄积了能

量,故本文将重点关注后三个阶段。

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 “由负变正”的根本原因

(一)自然增长由负变正的原因之一:并非由于“死亡率下降”“死亡数量减少”,而是死亡人数的缓慢上升低于出生人数的增多

笔者同时绘制了1978—2017年上海户籍人口历年出生数、死亡数和自然增长数变动状况图,三条曲线走势与图1一致。1978—1992年间,历年出生人数与死亡人数的差额先扩大后缩小,在1982年时二者差额最大,故1982年的户籍人口自然增长数是最多的。这一时期内历年出生人数一直大于死亡人数,因此户籍人口呈现自然正增长,直至两条线于1992—1993年第一次相交。1993—2011年,历年死亡人数与出生人数的差额先扩大后减小,在2003年时二者差额达到最大,故2003年时户籍人口自然负增长数是最多的。与上一阶段正好相反,这一时期内历年死亡人数都是超过出生人数的,故户籍人口自然变动为负,直至两条线于2011—2012年第二次相交。2012年时,死亡人数与出生人数的大小又有了反转,出生人数在经历了19年之后又一次超过死亡人数,户籍人口自然增长数由负变正。2012年之后的几年,两条线出现频繁相交,主要是由于历年出生人数波动比较明显所致,相应地,自然增长数也围绕着零值在正负之间波动。与图1中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两条曲线互动关系一致,出生人数曲线与自然增长人数曲线的走势变化也是几乎一致的。也就是说,自然增长数的变动主要是由于出生人数变动引起的,只是二者之间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那是因为死亡人数曲线在这些年间一直呈现比较稳定的、微幅增长的趋势。

所以,一些媒体所报道的导致2012年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20年首现正增长的因素之一——“随着户籍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死亡率降低”,“死亡数量减少”等判断,其实是不准确的。事实上,户籍人口历年死亡率并没有下降,死亡人数并没有减少。如果要从死亡这一因素出发解释户籍人口由负增长转向正增长的原因的话,准确的判断应该是,死亡人数尽管持续缓慢上升,但低于出生数量的增长。究

其原因,确系“上海户籍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使得死亡率的上升比较缓慢。统计数据显示,1993年以来,上海户籍人口平均预期寿命逐年在提升,已从1993年的75.97岁提高至2016年的83.18岁,23年间提升了7.21岁。其中,男性户籍人口从74.04岁提高至80.83岁,提升了6.79岁;女性户籍人口从77.91岁提高至85.61岁,提升了7.70岁。

(二)2004年以来的出生人数升高,是自然增长率提高乃至变正的主要原因

2004年以来的上海人口变动最终形成接近零增长甚至个别年份正增长的态势,主要原因还在于出生人数的逐步上升超过了缓慢增长的死亡人数。1993年以来上海户籍人口年出生数经历了先减少后增加的过程。2003年之前,年出生人数不断下降;2003年是最少的一年,仅为5.73万人;2003年以后,年出生人数逐步增加。仅2004年一年出生人数就增加了2.36万人,从2003年的5.73万人增加到了8.09万人。2006—2007年出生人数又有了一个大的跳跃,由8.12万人增至10.08万人,增加了1.96万人,年出生数上到了10万人这一台阶。2007年之后,除了个别年份的出生人数略低于10万人以外(2008年和2009年出生人数为9.67万和9.23万人),历年出生人数都在10万人以上,回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出生水平。2011—2012年的出生人数提高量也很大,增加了1.96万人,2012年以后出生人数波动非常明显,2013年下降到10.89万人,2014年又上升至12.41万人,2015年又下降到10.59万人,2016年又回升至13.07万人。《2017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全年户籍常住人口出生11.20万人,比2016年有所下降。

(三)出生人数增多主要来自于一孩出生,“二孩政策时期”的二孩出生数对出生总数增加的贡献虽有所增加但仍有限

那么,出生人数增多主要是由于一孩出生数还是二孩出生数的增多引起的呢?从孩次率来看,2004年之前上海户籍人口出生一孩率一直在95%以上,2004年上海实施“双独两孩”政策后,一孩率缓慢下降,二孩率逐步上升。2004年时,户籍人口出生二孩率为2.80%,2012年为8.39%,2013年突破10%升为10.45%,2014年为14.96%,2015年突破20%升至

22.64%。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上海户籍人口出生的一孩率下降至71.9%,二孩率上升至27.4%,几乎回到了1979年时的水平(一孩率为71.6%、二孩率为27.3%)。2004年以来特别是近几年,随着生育政策的陆续放宽,出生人数逐步增多但仍有波动,二孩率则呈逐年提高之势。笔者绘制了1992年以来上海户籍人口历年出生总数、一孩出生数及二孩出生数三条曲线。直观来看,一孩出生数与出生总数两条曲线的波动是几乎并行的,特别2004年以前两条线几乎是重合的,2004年尤其是2012年之后,两条线之间的差距由于二孩出生数的增多而有所扩大,但二者的波动仍几乎是一致的。这初步说明,二孩出生的增多对出生总数增多有一定贡献,但一孩出生数才是引起出生总量波动的主要原因。

表1 一孩出生数、二孩出生数对相应时期内
年出生人数影响的模型分析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标准化)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标准化)
1993—2016年 一孩出生数	1.264*** (0.095)		0.746***			
1993—2016年 二孩出生数		2.027*** (0.361)	0.387***			
2004—2016年 一孩出生数				1.217*** (0.292)		0.642***
2004—2016年 二孩出生数					1.248*** (0.302)	0.638***
C	-1.408* (0.767)	7.238*** (0.379)		-0.934 (-2.684)	8.902*** (0.426)	
N	24	24	24	13	13	13
adj. R ²	0.884	0.570	1.000	0.577	0.572	1.000

注:***与**分别表示1%和5%的显著性水平;()里是回归系数标准误差。分孩次出生数由孩次率乘以出生总数得到,孩次率来源于《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统计资料主要数据汇编(1982—2010)》、上海市卫生计生委官方网站<http://www.wsjsw.gov.cn/wsj/n473/n2413/index.html>

进一步地,笔者构建了如表1所示的6个线性模型来分析一孩出生数和二孩出生数对出生总数的影响。模型1-3的因变量是1993—2016年上海户籍人口年出生总数。其中,模型1的自变量是此时段历年一孩出生数,模型2的自变量是此时段历年二孩出生数,模型3中同时纳入这两个自变量,并且取标准化

回归模型。2004年4月15日施行的《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取消了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夫妻应当有4年生育间隔的规定,2014年和2016年“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陆续在上海落地,故可将2004年看作时间节点,此前为“一孩政策时期”,此后为“二孩政策时期”。2004年也是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变动进入第三阶段的第一年。因此,模型4-6以2004—2016年的上海户籍人口年出生总数为因变量。其中,模型4的自变量是此时段的历年一孩出生数,模型5的自变量是此时段的历年二孩出生数,模型6中纳入这两个自变量,并且取标准化回归模型。

模型1和模型2的结果表明,1993—2016年上海户籍人口一孩出生数变动可以解释出生总数变动的88.4%,二孩出生数变动可以解释出生总数变动的57%,说明一孩出生数和二孩出生数均可解释出生总数的部分变动。模型3的结果显示,一孩出生数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746,远大于二孩出生数的标准化回归系数(0.387),进一步说明相对于二孩出生数而言,一孩出生数对总出生人数的影响程度更大。模型4和模型5的结果表明,2004—2016年一孩出生数可以解释该时期年出生人数变动的57.7%,二孩出生数可以解释57.2%。模型6中一孩出生数和二孩出生数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642和0.638,显示出即便在“二孩政策时期”,一孩出生数的变动对总出生人数变动的解释力度仍高于二孩出生数,尽管二者的差距在缩小。比较模型1和模型4的adj.R²可知,“二孩政策时期”一孩出生数对出生人数变动的解释力度有所下降。比较模型2和模型5的adj.R²可得,“二孩政策时期”二孩出生数对出生人数变动的解释力度有所提高。综合来看,无论是“一孩政策时期”还是“二孩政策时期”,上海户籍人口年出生人数的变动都是由一孩出生数变动而引起;不过,“二孩政策时期”二孩出生数变动对出生总数变动的解释力度有所提高,一孩出生数变动对出生总数变动的解释力度有所下降。

同时,笔者计算了2004年以后的“二孩政策时期”年出生人口数增加量比较大的几个典型年份的一孩出生数增量和二孩出生数增量分别占出生总数增量的比重。其中,2004年分别为97.74%和2.17%,2007年为96.05%和3.93%,2010年为79.92%和19.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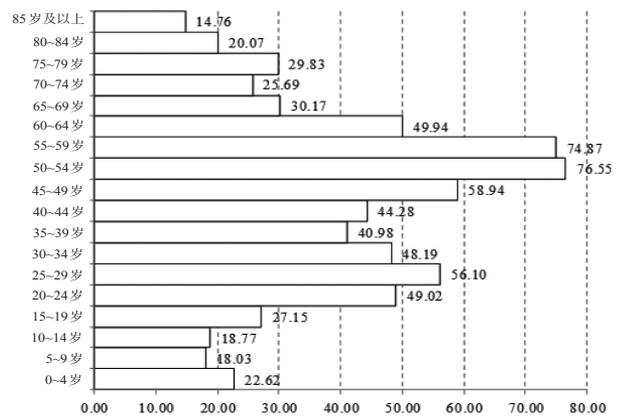
2012年为84.69%和15.17%。可见,2004—2012年间,尽管随着二孩出生数的增加,一孩出生数增量占出生总数增量的比重有所下降,二孩出生数增量的比重在上升,但是一孩出生数对总出生人数变动的的影响始终占绝对主导地位。直至2014年“单独两孩”政策实施,二孩出生量有所释放,二孩出生数增量占出生总数增量的比重显著升高至47.24%,与一孩出生数增量占出生总数增量的比重(52.37%)的差距缩小,但仍低于一孩出生数的贡献。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二孩出生进一步释放,当年出生人口中二孩率显著升高,二孩出生数增量占出生总数增量的比重(49.02%),刚追平一孩出生数增量(48.31%)。这些分析均充分说明了上海户籍人口年出生人数的变动主要还是由一孩出生引起的,二孩出生数的增加是出生总数增加的一个原因,但其对出生总数增加的贡献仍处于相对次要地位。

(四)2003年以后,新婚人口数增多是一孩出生数增多的原因所在

那么,为什么2003年以后会出现一孩出生增多的情况呢?在我国非婚产子不被认可的情况下,结婚仍是生育的前提,因而新婚人群的数量无疑是影响一孩出生数的最大依据。通常情况下,结婚和生育总有时差。有学者曾利用2000年“五普”长表数据研究发现,我国育龄妇女初婚初育间隔的时间长度集中度很高,近七成是结婚后一年半以内生育,90%在婚后两年半以内生育。^[2]据笔者计算,1987—2014年间的上海市育龄妇女历年平均初育年龄与平均初婚年龄之差的均值为1.38岁,绝大多数年份的间隔都在1~2年之间,少数年份小于1年或多于2年,没有间隔大于3年的年份。因此,笔者判断前一年的新婚登记人数对当年一孩出生数变动的的影响较大,故使用1988—2016年的一孩出生数与前一年的新婚登记人数(即1987—2015年的新婚登记人口数)对二者进行Pearson双侧相关检验。结果显示,二者高度相关,Pearson相关系数r为0.731,且通过统计学显著性检验(P=0.000)。这一时期的数据还显示,t年一孩出生数与t-1年新婚登记人口的走势非常相似,t-1年新婚人口在2003年之后不断上升,正是2003年以后一孩出生数增多的原因所在。值得注意的是,数据也显示出t年一孩出生数低于t-1年新婚登记人口,且二者之间的差距有

拉大趋势,表明越来越多的人结婚后不马上生育。

图2 2010年“六普”时上海户籍女性年龄构成(万人)



(五)育龄妇女人数处于一个小的峰,是新婚人口数增多的原因所在

紧接着的问题是为何2003年以后新婚人口数会增多呢?这就需要分析上海户籍育龄妇女人数、年龄构成、平均初育年龄等的变动状况。历史生育统计数据显示,1981—1989年是上海户籍人口出生的一个高峰,每年出生人口在15万人以上。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户籍女性的平均初育年龄为26岁左右,2000年后持续上升,从2000年的26.11岁升至2015年的29.01岁。以25~30年左右为代际更替的时间,1980年代这一轮出生高峰中出生的女性正好在大约2005年前后步入生育旺盛期年龄。图2展示的“六普”时上海户籍育龄妇女年龄构成印证了这一判断。图2中的45~49岁组、50~54岁组、55~59岁组、60~64岁组女性倒推25~30年,正好是1980年代处于生育旺盛期的那一批妇女。图2显示,这几个年龄组的户籍女性人数确实是比较多的,并且这一批女性的女儿们正好在近十年逐步进入生育期,即图2中的20~24岁组、25~29岁组、30~34岁组、35~39岁组的生育旺盛期育龄女性。相比较而言,这一批育龄妇女的人数仅是她们母辈的75%,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仍以一孩生育为主的近十余年,这一轮的出生高峰相比较1980年代而言,只是一个非常小的峰。

户籍人口生育水平和出生人数的未来趋势及其应对

一个国家人口的整体生育水平是由每个个体的

生育行为集合而成的,而个体的生育行为又主要是由其生育意愿决定的。群众的生育意愿可以通过社会调查了解,这正是过去几十年国内大量开展生育意愿调查的原因所在。1980年代初期以来长达30多年的时间内,原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市人口计生委”),以及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市卫计委”)持续在上海全市范围内开展了10项户籍人口生育意愿调查。这10项生育意愿调查的纵向结果显示,30年来上海市户籍育龄人群的意愿子女数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1983年的平均意愿子女数在2个左右,1992年、1994年、1998年三次调查显示平均意愿子女数在1.5个左右,2003—2012年间的四次调查显示,平均意愿子女数已降到1.3个以内。^[3]2013年的调查采集到了8501位20~49周岁、在婚状态、夫妻双方至少有一方为上海户籍的受访者的信息,他们的回答显示平均意愿子女数为1.46个,与前几次调查相比有所回升。^[4]不过,上海育龄人群对两孩政策的实际响应“遇冷”,说明了以1.46作为生育水平的参考值是偏高的,即使实际生育水平能达到1.46,也是属于远低于更替水平(一般为总和生育率等于2.1)的低生育水平。

事实上,在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伴随着社会转型、经济转轨、人口转变的进程,在社会经济因素和限制性生育政策的双重影响下,人们的生育意愿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少生优生”“注重孩子质量”的观念,并且这样的观念已经反映在人们实际的生育行为中,“只要一个孩子”已成为大部分家庭的现实选择。自1971年以来,上海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已有46年一直处于低于2.1的更替水平,且其中1993—2011年的18年间总和生育率持续低于1的超低水平。2003年是上海户籍人口生育水平最低的一年,总和生育率仅为0.64。2004年以后的“二孩政策时期”户籍人口的生育水平缓慢上升,但是上升幅度非常有限。2014年“单独两孩”实施,总和生育率也仅回升至1.14,2015年又回到1以下(0.97)。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的第一年,生育潜能有所释放,但总和生育率水平也仅回升至1.1。可以预判,随着两孩政策的推行和逐步被接受,上海户籍人口的生育水平可能会有回升,但是显著性提升的可能

性不大。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生育水平由高到低易、由低到高能,即使有鼓励政策,生育水平的回升也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5]迄今为止,全球范围内尚未见哪一个国家或地区当长期处于低生育水平、超低生育水平时,能够在各种鼓励生育政策的作用下将生育水平回归至更替水平的事例。

同时,前文分析表明上海户籍育龄妇女的年龄构成老化明显,在20~39岁生育旺盛期的妇女人群后面就是一个大大萎缩的19岁以下人群。因此展望未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于1980年代出生高峰的育龄妇女将逐步退出生育旺盛期,未来十年上海户籍育龄女性的人数将会持续减少,15~19岁组27.15万人,10~14岁组18.77万人。可见,这些年上海户籍人口出生数量的上升,主要是短暂的育龄妇女人群增多所致。未来随着育龄妇女人群的萎缩,出生数量上升的趋势必将告终,进而转为减少的趋势。

总而言之,2012年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变动在历经19年的负增长之后首次转为正增长,及此后几年在零增长附近的上下波动,是由于自2004年以来出生人数增多,并多过了一直处于小幅平稳增长中的死亡人数的结果。并且,出生人数的增多主要是由于一孩出生数增多所致。2004年以后的“二孩政策时期”,虽然二孩出生数逐步增加,但对出生总人数的贡献仍是处于相对次要地位;生育水平虽有小幅提升,但对出生人数增加的贡献有限。进一步而言,一孩出生数的增多是由于新婚的育龄妇女人群集中的缘故。1980年代出生高峰期间出生的女孩在近十年来年间陆续步入生育旺盛期,迎来了出生人数且主要是一孩出生数的增多。但是,随着育龄妇女人群的萎缩,出生人数特别是一孩出生数增多的现象也将稍纵即逝。未来10多年,即使“全面两孩”政策下生育水平有所提高、二孩生育有所增加,也不能抵消育龄妇女人数减少和年龄结构老化所致的下降效应,上海户籍人口的出生人数总体上将呈现下行趋势。因此,近年来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变动由负增长转向零增长甚至正增长只是一个暂时性的现象,或者说只是昙花一现,而并不能改变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变动负增长的长久性趋势。

从全国出生人口形势来看,“全面两孩”政策出台之后,2016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比2015年增加

了131万人,生育政策调整释放了一部分生育潜能;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63万人,原本预期中的2017年出生会继续增加的情况并未出现。事实上,2017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已达到50%以上,比2016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但即便如此也未能扭转出生人数下行的趋势。而导致出生人数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育龄妇女人数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的减少导致一孩出生数大为减少。预判未来一段时期内,伴随着全国育龄妇女规模缩小和年龄结构老化,全国出生人数总体也会呈现持续下行趋势。在育龄妇女人数尤其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必将减少的客观形势下,尽可能地提高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是缓和出生人数下行趋势的必然选择,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十三五规划的说明中提出的“进一步释放生育潜力”是当务之急。^[6]当下,可以从取消生育限制、转变婚育转念、提供经济支持和完善生育保障几方面着手进一步释放生育潜力。

其一,尽快取消生育限制。尽管多生多育早已不再是主流的生育观念,但还会有很少部分的人愿意生育三个或者以上的孩子,放开生育限制让愿意多生的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自主决定生育数量,可以释放一部分生育潜力。

其二,转变婚育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个方面都经历了并继续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文化传统变迁、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人口转变等,这些宏观方面的变革都作用于家庭制度的历史性变迁。家庭结构从传统的超核心亲属关系变迁为现代核心家庭。家庭小型化,家庭内部人口容量向组成家庭所需的最低限度人口接近。家庭的代际关系从以血亲主位、父子轴心,到以婚姻主位、夫妻轴心转变。^[7]家庭代际重心逐渐下移,生育孩子在家庭内部已是一件“极不划算”的事情。并且,经过几十年计划生育工作的宣传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影响,“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婚育观念逐步深入人心甚至根深蒂固,生育这项对于传统大家庭而言最为主要的功能,在现代核心家庭中显著弱化。如果要提高生育水平、进一步释放生育潜力,婚育观念的转变非常重要,故应提倡新型的婚育文化。新型婚育文化应宣传倡导适龄婚育而非晚婚晚育,还应摒弃少生的观

念,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孩子”,比如回到“一个太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宣传口号。

其三,加大家庭育儿的社会化支持。育龄人群生育意愿低的主要原因,还有养育成本高和照料压力大。不可否认,当前育龄人群子女养育压力与政府对家庭养育行为给予的支持不足有关。过去在单位制时期,公共幼托和育儿系统相对发达,家庭育儿和养育困难相对较小,并且当时是多子女养育时代,子女养育的精细化要求没有现在高。而现在相对便捷的单位幼托系统的解体、养育期望和要求的提高导致了子女养育难度加大,正挑战着年轻父母的工作与家庭的平衡能力,也挑战着家庭的经济供养能力。因此,构建与生育政策配套的社会经济政策和发展型的家庭政策,帮助家庭履行生育和养育的功能,鼓励和支持家庭生育孩子、照料子女是当前的努力方向。建议如下:促进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增强社区幼儿照料等服务功能;研究制定为生育二孩的家庭提供适度经济支持的政策,比如,适当的税收减免和生育补贴;促进育龄人群主要是职业女性工作与家庭关系的平衡,鼓励用人单位制定有利于职工平衡工作与家庭关系的措施。

参考文献:

- [1] 顾宝昌.从上海看人口负增长.中国人口科学,1994(6);朱国宏.负增长:上海人口发展的新态势.社会科学,1994(11):45-4;朱国宏.面对负增长:上海人口政策是否需要改变.人口研究,1995(1):3-9.
- [2] 李玉柱、姜玉.80年代以来我国妇女初婚初育间隔变动分析.西北人口,2009(3).
- [3] 顾宝昌等.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人口研究,2011(2).
- [4] 陈蓉、顾宝昌.上海市生育意愿30年的演变历程.人口与社会,2014(1).
- [5] 杨昕.低生育水平国家或地区鼓励生育的社会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西北人口,2016(1).
- [6]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制定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说明.新华社,2015.11.3.
- [7] 王润平.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中的文化传承方式探析.社会科学战线,2004(3).

编辑 李梅

Theoretical Analysis on Several Basic Issues about Property Tax
—— A Discussion with Prof. Liu Xiaobing, Prof. Zhou Tianyong, Prof. He Yang

Yi Xianrong

Abstract: In the prospect of initia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perty tax in China, it is an essenti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to ensure living justice, to contain the real estate bubble, and to forward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However, there are public misunderstanding and varied academic arguments essentially due to unclear understanding to basic issues and key concepts.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se issues and concepts theoretically and argues that property tax is the trading price of the public services provided by local authority. The 70-year-state-ownership of land is a hypothesized claim against the householders in China. In reality, the ownership of land is substantially transferred to the householder after completion of land transaction, which is safeguarded by Property Law. Land-transferring fee is the price of land transaction in the market system; it is not land rent or tax. Therefore, implementing property tax i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principles of market economy and legal basis.

Key word: Property Tax, Land Transaction Price, Substantial Ownership of Housing and Land, Land-transferring Fee

Big Data and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 A Discussion with Jack Ma and Professor Zhang Xukun

Cheng Chengping & Deng Guoqing

Abstract: Big data helps to expand the margin of human rationality, reduce opportunistic behavior as well as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production and transaction in economic activity. However, big data is difficult to dispel uncertainties arising from changes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the needs and preferences of people, to solve the Hume Problem. Therefore, big data does not completely eliminate transaction costs. Due to the restriction of transaction costs, there are insurmountable problems in the planned economy and the market economy. In contrast,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has comparative advantages. Big data can not fundamentally change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But making good use of big data will promote government productivity and market efficiency, thus contributing to the perfection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Key Word: Big Dat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Planned Economy, Market Economy

New Family Planning: Chinese Population Policy's Transformation and Reform

Ren Yuan

Abstract: China has implemented the new "Two Child Policy" since 2016. It shows a series of policy transition, and it calls for Chinese Family Planning institution's further transformation and reforms. First, this paper illustrates China's Family Planning has strong characteristics of administrative family planning, and government-imposed birth quota policy is the main policy tool of family planning. The main purpose of Chinese Family Planning is to control the fertility and to foster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Second, Family planning and the related fertility policies need to have profound reforms after China accomplished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fter 2000. Third, the paper concludes the basic framework of "New Family Planning", which includes abandoning the administrative birth-quota limits and providing better and comprehensive reproductive health care and family services, avoiding lowering fertility trap to achieve the long-term population balance, and uses more family friendly social policies to provide reproductive and family services, and so on.

Key Word: Post-Demographic Transition, Family Planning, New Family Planning, Transformation and Reforms

Historical Turning or Transient Fluctuation :
An Empirical Study about the Natural Change of Household Registered Population in Shanghai

Chen Rong & Gu Baochang

Abstract: The natural change of the household registered population in Shanghai after experiencing negative growth for 19 years, was turned to positive in 2012, and remained around zero growth in the next few years. Whether this directional change is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or a short-term fluctuation deserves for examination.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natural change of the household registered population in Shanghai turning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is the result of an increase in births since 2004, which is more than the deaths that have been in a small and steady growth, and mainly due to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first child births, as the result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The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are affected by the periodic fluctuation of the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With the shrinking of the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the increase in births, especially the increase in one child births will soon vanish. Therefore, it may conclude that this directional change is only a temporary phenomenon, which cannot change the long-term trend of the negative growth of Shanghai's household registered population.

Key word: Natural Change of Population, Negative Growth, Positive Growth, Zero Growth